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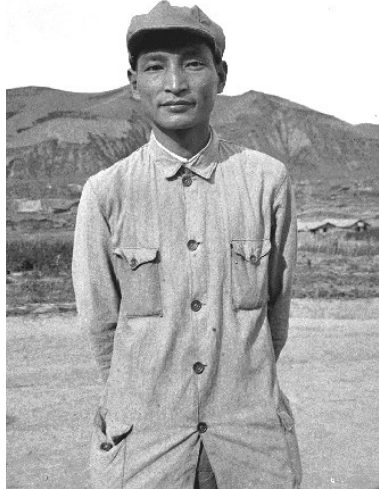
怎样做好干部、怎样用好干部？

——重温陈云《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

□ 吴泽群

核心阅读

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于1940年11月撰写了《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这篇讲话提纲，堪称早期党的干部工作的经典之作。文中诸多重要思想，如党的干部应当具备四条标准、要全面做好干部工作、要加强干部部门自身建设等，今天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



陈云自1937年12月至1944年3月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七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干部工作的文稿，其中1940年11月撰写了《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这篇讲话提纲堪称早期党的干部工作的经典之作，文中诸多重要思想今天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

明确党的干部四条标准

陈云指出，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对于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的模范。所以，党的干部应当具备四条标准。

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他说，忠实，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教育和锻炼的过程。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对党忠诚至关重要，并且时刻在接受严酷环境的考验。早在1939年5月，他就指出，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这一点正是我们党在各种风险考验中不断走向更大胜利的最终奥秘。

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他说，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只有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在此之前，他就反复指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这一标准，生动地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工作中的实际运用。

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他指出，在中国这么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又处于战争环境，必须要求干部能独立工作，在失去联系时也能独立负责。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方面的楷模。遵义会议之后，他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历经艰难险阻，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没有对党组织的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勇于担当，而能牢记使命独行万里，满怀信心去争取胜利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守纪律。他指出，纪律是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武器。此前他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讲话中指出，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他说，怎样才叫作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陈云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就是政治和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四条标准既是“挑选干部的标准”，同时是“干部自己检查自己的标准”。

全面做好干部工作

对于做好干部工作的各个方面，陈云首先分析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然后亮明做好这项工作的基本原则，再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存在哪些缺点，最后指出正确的工作办法，通篇论述有的放矢，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提拔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能上能下。陈云指出，提拔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要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干部要能上能下。一般不越级提拔干部。干部提拔是针对党的整个干部队伍而言，要持续不断地选择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补充到不同层级的领导岗位，以利于积极顺利推进党的事业。对干部个人的工作历程而言，提拔则不一定是必然的事，不能适应党的事业发展需要时，能下也是一种应当愉快接受的组织安排。

使用干部要兼顾干部才干和工作需要。陈云指出，使用干部要兼顾干部才干和工作需要，要用其长，合理地经济地使用干部，把干部放到当时当地最需要的环节上，放手使用，同时要经常地适时地检查和帮助。适当分配之后，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轻易调换，以造就人才，积累经验。对于模范干部，要有计划地逐渐分配到各地方去，特别是落后

的地方。可以看出，用干部的根本目的就是这一切为了把工作搞上去，而不是为了照顾干部或者其他。

培养干部要理论教育和实际使用相结合。陈云指出，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有经验者，从理论上去反省经验；无经验者，理论与实践相配合。实际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延安时期，在他的指导下，中央组织部参与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培训班、鲁迅艺术学院及中央组织部干部培训班等，培养了一大批适合事业发展需要的各类干部和人才。

以党的利益为重去加强干部团结。他指出了当时干部不团结有四种情况，分析了干部闹不团结的主观原因，指出必须使所有干部认识一个基本问题，领导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党，所有干部都必须在维护党的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后来，他在谈各类干部要加强团结时还指出，世界上一切事业实质上都是合作办成的，干好革命就是大家商量出来的。

加强干部部门自身建设

干部工作是组织部门中最主要的工作。他曾用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12个字概括了“用人之道”，在这篇文章中对干部工作的要求则更加深化、系统化、规范化。

对干部工作部门的干部有特殊要求。陈云对干部部门的干部要求更高。他说，干部部门要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干部，人选力求忠实、公正、有能力（包括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社会经验，以及细心、耐烦等）、上下信任，使之符合于党的发展的需要。

要充分了解干部、爱护干部。干部部门应经常了解、考核、选拔干部，向党委提供意见。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要真正爱护干部的政治生命，鼓励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在延安时期，有两个干部找到陈云，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读书，但人家已经控告他们都是托派分子。为了查清问题，陈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陈云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其他成员

来调查，足见他爱护干部的分外重视。他认为“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亚于父母爱护子女”。

按程序办事。陈云要求，干部的任免、奖惩等重大事项，应按组织原则，根据考察材料，并考虑干部部门的意见，经党委会讨论通过，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

重要启示

向领袖学习科学工作方法和崇高精神。文中的重要观点和蕴含的思想境界值得我们每一名干部深思和学习，要正确对待党的事业和党的利益，正确对待自己和人民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职务、职级、待遇等变动问题。纵观陈云的革命生涯，他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党的事业出发的典范；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典范；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磨炼、提高的典范；对党忠诚、毫无个人私利的典范；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典范。

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在几十年实践探索的基础上，1995年我们党制定历史上第一个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法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突出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指明好干部的“六条标准”，指导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久前又全面论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些重要思想更加突出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更加强调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重要领导和把关作用，更加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温故知新，继续做好党的干部工作，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夺取“四个伟大”新胜利无疑意义十分重大。



杨立华教授的新著《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是一部纯哲学的力作。自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以来，创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一直是学者们的追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建构都是这一追求的具体体现。然而，随着学科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哲学史的工作上。近年来，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中国哲学登场”的呼吁再次响起。这呼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期许，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自觉——语言的自觉、方法论的自觉、“自立吾理”的自觉。“如何写”中国哲学，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问题。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在现代汉语已经成为思想表达的基本语境的当下，尝试“让中国传统哲学说现代汉语”体现了本书作者语言上的自觉。在表述上，本书选择了论证的方式和体系化的形态。这一选择针对的是时下盛行的将中国传统思想视为某种无需论证的理智直觉的误解。虽然哲学在表述方式上并没有固定的形态，但在西学的论证传统的压力下，选择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形态凸显中国哲学的论证品格、重述中国哲学的基本洞见，是有其必要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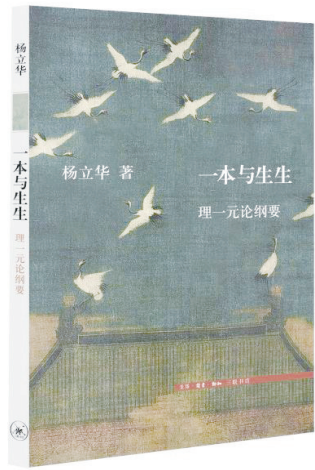
在“自立吾理”的宗旨下，以“一本与生生”为题，很恰切地体现了本书纯粹“中国哲学”的特质。与西方哲学更关注“存在”本身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是“让存在继续存在”的问题。杨立华教授这部著作的根本问题——“生生何以不已”，讨论的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

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世界观，由于经验的不确定性，不能为人生提供确定的地基。价值的重塑，需要哲学的根源性思考作为背后的支撑。从“生生何以不已”的问题出发，以生生变化的世界的无始无终作为思考的起点，本书作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承续，呈现出与西方迥异的思想道路，以及对于世界、人生截然不同的理解。

在具体的论述中，本书使用了许多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西方哲学概念，比如质料与形式。若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类概念还原到其原初的语境，将错失理解本书思想肌理的可能。在通常的语义中，质料就是材料，形式就是文理，不必将其回置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才能获得理解。在本书的理一元论体系中，质料是完全多余的概念，一切质料都是质料化了的形式。作为生生不已的根源的理本体，是不可被质料化的形式。理本体在具体存有层面的最高实现，就是人的心灵。人性作为心灵的不得不如此的本质倾向，与理本体是同一的。这一“性即理”的当代呈显，为一种应然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形上学基础。这一经过了论证的应然，就是价值的本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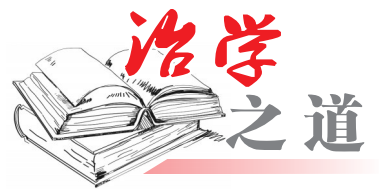
面向当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 唐纪宇



价值的确立将理论思考与现实世界关联起来，从而使哲学有可能真正成为引领性的力量。以创造、节制、公正、开明为“仁义礼智”在现代世界的精神内涵，是本书的立意所在。将“仁”理解为创造是极具特色的思想创发。这种理解是对以生意言仁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作为心灵的主动性的实现，“仁”指向的是一种生命力饱满洋溢的生活。在这一诠释向度里，劳动的概念呼之欲出。作为创造的最典型的形态，劳动是心灵的主动性的实现，也是“仁”在当代世界的具象。

作为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追寻的一个结果，杨立华教授这部著作构成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部向所有面对时代问题并有根源性思考愿望的人敞开的著作。此书既是传统思想的重生，也是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



曾国藩是晚清身居要职的重臣，更是皓首穷经的鸿儒。他在家书中提及最多的是读书学习，曾嘱子孙不欲做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其治学之道，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治学目标：进德修业，经世致用

自宋以来，湖湘一代盛行奉程朱理学为正宗、重经世务实的学风，理学家毕生所追求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中前半部分讲修身养性，后半部分便是经世之说。这对曾国藩的读书治学之道产

曾国藩的治学之道

□ 杨彩霞

生很大影响。

曾国藩曾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即修养美好德性，无愧父母宗祠；修业即钻研学问经典，以求谋食立身，而此二者，俱与功名无关。曾国藩曾数次科考不中，深知科举取士的危害，在他看来，科考书目固定，应试文章八股，若单为考取功名而学习，则易读死书，死读书，若一生功名未中，而其他学问也无渐进，则是画地为牢。如此一来，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就是欲求一塾师也不可待。所以

曾国藩要求子孙读书要广泛涉略，终身学习，以自娱身心，富养精神，不求后辈为达官重臣，惟愿代有秀才。

同时，在曾国藩看来，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切忌空虚之学。在晚清朝廷危机之际，一介书生曾国藩将读书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创建湘军，兴办洋务。结合时局，曾国藩认为学问无外乎军政、船政、数学、格致等，遂选聪颖幼童远渡重洋，学习步算、制造诸科，翻译西方科技之书，以图自强。曾国藩博览群书，组建湘军时采用戚继光束伍练兵之法，整理盐政时采取陶澍的经验，整饬吏治时对照前人的得失成败……后来，曾国

藩成为一代“中兴名臣”，大概就是由于他能知行合一，将知识与社会发展和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缘故。

治学方法：看、读、写、作、录

古语说，砍柴不对纹，累死砍柴人，读书治学也是同样的道理。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写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阅读。曾国藩用商人积累财富和兵家攻城略地来比喻阅读，说明只要个体发挥积极主动性，阅读便可使人们迅速

获取新知，开阔视野，丰盈精神。然而阅读并不是漫无目的地看，一是要博学专精，在广泛涉略的基础上精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二是要读好书，读经典。

“读”，就是朗读、诵读。朗读不仅可以“忘忘所能”，使所学的知识能够真正掌握而不忘；而且可以朗朗上口，自娱其心，是以“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采其深远之韵”。

“写”，指的是书法。曾国藩曾因写字迟钝吃亏不少，所以教育子孙无论写哪种字体，要持之以恒地练习，最终达到写的又好又快的效果。

“作”，就是写作，任何思想或知识，只有付诸文字，才能将其传至更远。曾国藩主张为文平时要多多观察多积累，做到胸中有丘壑，这样做出的文章才言之有物，否则只是一种拙劣的文字游戏和华丽的辞藻堆砌，根本不足以称之为文。同时，人不是天生就能做文章，写作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实践的过程，要把天马行空的想象落实到纸上

笔端，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怕丑的心理。曾国藩教育正在学作赋的曾纪泽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此后弥不肯为矣……尔若学赋，可于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赋，或数千字，小赋或仅数十字，或对或不对，均无不可。”或许我们最初的写作只是从模仿名家名作开始的，但是只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最终自会分门别类，有自己的思想和气韵。

曾国藩虽只说了“读书四法”，但他的读书治学思想中还贯穿着做札记的方法，即“录”。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时，要随手做札记，如遇令人拍手称快的文字，要用朱笔标识。曾国藩在读书时常将心得和当时有疑问的地方分册摘录，随着学问的渐长，每有新的心得便记录在对应条目的下面，日积月累，便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功可强立，名可强成，曾国藩天资不算聪颖，但通过坚持不懈地静心治学，最终成为一位受国人敬仰的“学者型官员”。